

#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 小说文本分析

ZHONGGUO XIANDAI  
JINGDIAN DUANPIAN  
XIAOSHUO WENBEN FENXI

博雅导读丛书



刘俐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 小说文本分析

HONGGUO XIANDAI  
XINGDIAN DUANPIAN  
XIAOSHUO WENBEN FENXI

刘俐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经典小说文本分析/刘俐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博雅导读丛书)

ISBN 7-301-10725-0

I. 中… II. 刘…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072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

著作责任者: 刘俐俐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725-0/I·08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5.25 印张 44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导读 文学经典：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已经于 2004 年 10 月面世了。现在《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也与读者见面了。近年来我一直在短篇小说文本分析领域工作，两本书共计 40 篇文学作品分析，呈现了我对文本分析的理解，以及在分析中的发现。回到文学事实本身，不断地激发我的理论灵感，伴随着分析过程，让我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本书作为“导读”不可能将全部思考付诸文字，我准备在三个问题上展开讨论，一个是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文本分析和方法的关系问题，一个是阐释本书的几个特点。

### 一 关于文学经典的思考

文学经典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以自由多元论(liberal pluralism, 或译自由主义式的多元主义)这一政治话语质疑经典构成的“自然性”。80 年代“经典之争”开始在体制上显示出来，标志就是 Leslie Fiedler 和 Houston Baker 主编的《英语文学：打开经典》(*English Literature: Opening up the Canon*) (1981) 一书的出版。这本书的宗旨是向传统的文学批评实践及其认识论提出挑战。1983—1984 年，美国著名杂志《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主办了以文学经典为主题的讨论，刊登了一系列文章。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各种专著相继出版，文学经典成为西方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我国学术界回应西方关于文学经典的思考，展开了相应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经典的生成、性质、流变规律、功能以及消解等方面。应该说，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关于文学经典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在已然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面前，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愿意做什么？与此相关，我的思考如下：

1. 在我看来，文学经典就是在文学史上经受过历史考验，被普遍认可

的重要文学文本/作品。文学经典固然借鉴了已有优秀文学的经验和成就，但是创造性远远大于借鉴性。由于这些文学文本/作品具有创造性意义，所以才能在文学史上经受住考验，成为经典。或者说，由于艺术上的创新和成熟而成为经典。文学经典的形成原因很复杂。除了艺术上的创新和成熟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原因也非常值得注意：文本有写作时代的浓重痕迹，甚至带有幼稚的痕迹。作家所属的那个文学流派早已过去，时代和幼稚以及流派的痕迹成为了永远的纪念。这种文学经典在当今阅读中产生了很复杂的感受，值得研究。如收在本书中的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其艺术手法及文学观念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差异。在情节和人物心理状态的关系方面，外在故事结构的急剧转折及转化与人物内心始终平静如一形成了反差；以几大段诗开篇，给读者以听佛陀说法的心理感觉，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叙述气氛；粗线条的叙述话语，常常几句话就将很长一个时间过程的内容叙述完毕了。当然，这些特点也许恰恰体现了许地山的佛教感受和他对文学的理解。在文本分析中，我发现《缀网劳蛛》文本内部的特点以及它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原因都非常值得研究。

2. 文学经典对于文学理论的价值。文学经典是一种有待不断开发的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的精神文化资源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人们精神的滋养。文学经典是人类感情的库存，其中蕴含的人类感情丰富而且多样。用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and Methode*)中的说法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文物、传统哲学、经典文学等，都是历史流传物，这些东西一定能够向我们传递一些信息，并且具有教化功能，其教化功能通过历史流传物自身蕴含的人性的、普遍精神的有效张力而实现。历史流传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进去新的理解，新的理解不断地被融合到这个流传物中去，丰富着这些历史流传物。文学经典对于人们精神的滋养是其他文化形式不可替代的。其二，文学经典对于文学理论的价值。西方文学批评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许多经典叙事学家，甚至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家都从文学经典入手研究叙事理论。比如，法国经典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 Genette)在《叙事话语·绪言》中开篇就说：“本书研究的特定对象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但是，热奈特说得很清楚，“和一切作品、一切肌体一样，《追忆》由普遍的或至少超越个别的要素组成，它把这些要素集合成特定的综合体，独特的整体。分析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而正是从个别到一般：……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在希望理论为评论服务时我不

由自主地让评论为理论服务，”<sup>[1]</sup>确实，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就是因评论和研究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而成为经典叙事学的重要理论著作的。即评论为理论服务。何以如此？《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现象非常丰富，出现了一些以前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创新手法，从这些现象中可以提出和概括一些普适性的理论，并推进理论的发展。正如热奈特所说：“我觉得不可能把《追忆似水年华》当做一般的叙事，或自传体叙事，或天知道什么别的等级、类别、种类的普通例子来处理：普鲁斯特叙述的特殊性从总体上看是不可缩减的，任何推论在这里都将是方法上的失误；《追忆》只说明它本身。但另一方面，这种特殊性并非不可分解，从分析中得出的每一个特点都可以进行对照、比较或展望。和一切作品、一切肌体一样，《追忆》由普遍的或至少超越个别的要素组成，它把这些要素集合成特定的综合体，独特的整体。分析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而正是从个别到一般……”<sup>[2]</sup>我所阅读过的由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评论而升华为探讨理论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著作还有瓦尔特·比梅尔(Biemel Walter)的《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sup>[3]</sup>，在这部著作中，比梅尔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两位作家作了细致的现象学分析。还有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解读叙事》中的第12章，也是以《追忆似水年华》为对象讨论“错格的谎言”。用希利斯·米勒的话说：“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一个精彩的片断，它集中体现了将叙事中部的非确定性与源头的分裂连接起来的各种因素。”<sup>[4]</sup>这些研究路径表明，由于文学经典最典型地体现了它所属文体的存在状态，蕴涵的文学手法和艺术创新因素丰富复杂，因此更值得研究。依热奈特所说，《追忆似水年华》在遵从长篇小说规矩的同时出现了不少以往长篇小说中没有的叙事现象。《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在文学理论中的学术价值已经表明，《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对文学做出贡献，而且对文学理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据这个思考，我在本书中对于文学经典艺术价值的分析，特别注意文本中复杂特异的文学现象，注意这些现象在文学理论的概括提升中不可低估的意义。比如，关于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研究者已经做了杰出的工作，我则发现了《金锁记》的情节设计明显地呈现为平衡结构，即曹七巧吸收聚集恶与释放恶的两个阶段所组成的完整过程是一个平衡结构。人物的形象就在这个结构中臻于完成。但是这个表层叙述结构却具有深层的原因，或者说，小说叙述所获得的张力效果是让阅读和分析可以探寻到其深层原因。前后两个阶段的过渡，是通过曹七巧照镜子，看到人已经老了十年而完成的，这是中国小说中罕见的结构及叙述方式。

“金锁”的意象以及所产生的非同凡响的艺术效果都与此有关。本书的撰写过程,进一步证明了,文学理论的诞生脱离不了具体的文学现象,任何一个理论命题的诞生都有特定的原始语境。而文学经典对于文学理论的价值有待于深入开掘。

3. 关于作品和文本的思考。这个思考与我所执著的文本分析相关。我的两部书都用了“经典”字样,又都用了“文本”字样。那么,作品和文本的区别及联系何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论文《从作品到文本》<sup>[5]</sup>是我思考的主要借鉴材料。罗兰·巴尔特认为:作品是感性的,拥有部分书面空间(如存在于图书馆中);文本则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文本是基础,依据文本进行想象的产物就是作品,也就是文本被阅读就成为作品了。文本是对符号的接近和体验,作品则接近所指(signified)。也可以认为,作品自身作为一般符号发挥作用并代表了符号文化的一般类型。文本则相反,常常是所指的无限延迟(deferral):文本是一种延宕(dilatory);其范围就是能指部分。……从词源上讲,文本就是编织物的意思, *textus*, 意谓“织成”,文本就是由此转义而来。每个文本,其自身作为与别的文本的交织物,具有交织功能,构成文本的引文无个性特征,不可还原并且是已经阅读过的,它们是不带引号的引文。作品则是在一个确定(filiation)过程中把握到的。在借鉴罗兰·巴尔特思想的基础之上,我对作品和文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理解是:文学作品(work)可以被视为文学家创造活动的最终成果,意指源自特定的作者,具有文学属性并蕴涵特定意义的语言构造。文学中的文本概念,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的具体语言形态本身。作品与文本二者的内涵和所指皆有部分的重合,重合在于都是指称一个特定的语言构造形态;二者的区别是,作品,是指某位作家所创作的,并且被读者所阅读、与审美价值相联系的文本;文本,更侧重于语言形态本身,是没有被任何一种审美阅读所具体化了的语言形态,如果探寻艺术价值,只能在文本中进行。这也就是我在《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导读》中所说的,我的文本分析意在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区分作品与文本,意味我们对于文本可以不断地分析研究,不断地发现其艺术价值,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则可以从文本中具体化一个作品。审美价值就是这样不断延伸的。文学经典就是在艺术价值的不断重新被发现以及审美价值的延伸中焕发其永恒魅力。

以上所讨论的问题侧重从文学经典本体角度来思考,但已经开始渗透了对于文本分析的思考。下面我进而从方法论角度展开讨论。

## 二 在文本分析中我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各种方法？

1. 问题提出的缘由。《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出版之后，一方面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读者给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质疑，其中质疑对我的启示和帮助最大，因此让我高兴和感动。有读者提出，这样一种文本分析，究竟是为了让文学经典文本为各种理论方法作注解，证明那些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呢？还是通过分析揭示文学经典的奥妙呢？如果是前者，在文本中引述的理论都是一些片断，不是完整的理论表述，并不圆满。如果是后者，又显得过于注重理论而对奥妙描述不够。这个问题很有趣。一方面确实眼光尖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提出者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对于艺术奥妙的描绘和揭示与理论方法的运用不可同时并存。我的回答是，我的文本分析是借助于某些方法揭示和解释文学经典的艺术奥妙，也就是揭示及解释艺术价值构成的机制。我认为对艺术奥妙的描述和揭示与自觉地运用理论和方法并不矛盾。同时我也明白，毕竟如此有意识地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分析一个文本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肯定会有不够圆满之处。比如，如何处理好对理论方法的介绍和具体分析的关系，怎样在解析中保存文学经典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动性等，确实值得继续探索。这个问题的最大价值在于，引发我深入思考运用各种方法分析文本和文学经典文本自身之间的关系。

2. 面对文学经典的研究路径问题，是我思考“在文本分析中我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各种方法？”的第一方面。当我们说某作品是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等于我们已经认可了它的价值。那么，我们要研究文学经典，就是以文学经典的效果为逻辑起点的。这就涉及到文学经典研究的路径问题。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所提出的共时语言学理论，把语言作为一种功能系统来理解，从共时的角度观察语言，努力把这个系统中使得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得以存在的规则和程式说清楚。也就是从语言的效果出发，说清楚这个效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思路被文学理论家们所借鉴，并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o)在他的理论著作《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明确提出，“在文学研究中也有一個经常被忽略的基本区别，就是两个课题的区别：一个根据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另一个与其相反，它从形式开



始,力图解释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诗歌学和解释学的对比,乔纳森·卡勒指出语言学的模式形成文学研究中相应的诗歌学研究模式,而文学研究中的解释学的模式则是从法律和宗教领域中借鉴的。在法律和宗教领域里,人们试图对具有权威的法律文本和神圣的宗教文本加以解释,目的是对如何行动做出决定。乔纳森·卡勒认为,“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他进而指出:“以意义或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诗歌学)与寻求发现意义何在的方式(解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sup>[6]</sup>乔纳森·卡勒给我们描述出了面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两种姿态。其他一些理论家比如英国文学理论家燕卜逊(William Empson)也谈到过,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解释。后面我们还会介绍到燕卜逊的相关思想。《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神曲》等,这些文学经典在漫长的历史隧道中是如何逐步被经典化的,这是需要从文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考察才能得到解释的,无论成因多么复杂,这些作品毕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了,也就意味着它们有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在的依据,对此,我们目前的研究模式就应该是诗歌学的,即说清楚它们的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那么,怎么说清楚呢?我们以往习惯运用单一的社会学方法,那种研究方式的研究结论一般来说属于社会和历史,而不是属于文学艺术的,与解释艺术效果的形成原因相距甚远。应该说,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因为其构成中艺术特性的含量大,艺术手法和现象丰富,所以,承受各种批评方法的能力就更强。或者换个角度说,各种理论和方法在运用于文学经典分析过程中更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当我们采用各种方法在不同的层面进入作品,进行分析,然后自然地转换到评价的时候,所做的其实就是揭示艺术效果何以可能的工作,这属于诗歌学的研究。我在《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已经开始探索诗歌学的研究模式,试图通过分析回答,这些作品为什么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中能持续挥发其艺术魅力。而这种诗歌学的研究模式,就是我所理解的对于文学经典最适合的研究路径,落实到我的工作中就是所谓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这个认识,在《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已经初步形成,在本书中进一步明晰并成为自觉的研究理念。我也确实有了不少惊喜的发现。比如,从文学经典的效果出发,会引发出与其他文本效果会通性的把握。比如,我分析废名《桃园》的时候,发现王老大家在街上买的玻璃桃子被孩子撞碎后,出现了一个隐喻效果,暗喻在家里的女儿阿毛

死了。这让我联想起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几乎同样的艺术效果。这两个作品也都能引起神奇的联想,这是隐喻所产生的功能,即描写一处的物象以喻另一处的物象,或者说都充分利用了意象。或者是用一个意象置换另一个意象,或者用一个意象比喻另一个意象。再比如巴金的《复仇》具有多层次的解读效应;一个话题勾起了不同国别不同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个话题似乎永无完结,还在引起今人的兴趣,读者阅读,就是参与对这一话题的讨论。这样的艺术效果也发生在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中。我在《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对《舞会以后》的分析《一段空白所决定的一生》一文,已经阐释过这个效果产生的原因。会通发现促使我们探寻相同乃至相似艺术效果的机制何在。现在通过对于《复仇》的分析,和《舞会以后》相联系来思考,我发现故事套着故事,是两个短篇共同的叙述策略。最外层的故事是一个讲故事的现场。其区别在于,在《舞会以后》中有两个故事叙述者,所以我的文本分析中有一个小标题就叫做“两个层面的叙述及其魅力”。《复仇》中有三个故事叙述者,所以我的文本分析中有一个小标题就叫做“三个层面的叙述及其宽阔的阅读空间”。分析《复仇》的文章题目为《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意在表明选择一个话题在不同叙述层面讲故事的小说艺术是中外作家的默契。可以说,诗歌学的研究路径贯穿于这部书的始终。

3. 运用方法分析文本,就是为文学经典中的艺术特性进行命名。文学经典凝聚了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技巧和创新。文学经典是优秀作家精神创造活动的产物。作家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他们总有些不同于已往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艺术处理方式,但是作家的思维方式以感性为主,他们已经将自己的艺术创新和对于文学的理解凝练在文本中,文本就是他们表述的方式。他们不善于用理论的语言,而是用概念和范畴来表述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如果我们请作家表述自己渗透在某部作品中的对文学的理解和创新,他们依然会用感性语言而不是用概念和范畴来表述。关于这一点,一些卓有成就而又能深刻理解文学创作的理论家认识得很清楚。比如,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述话语·后记》中说:“但我认为我们不应盲目相信一位作家,……一位大艺术家的美学意识可以说从来跟不上他的实践,这仅仅是黑格尔以密涅瓦之鸟的迟飞为象征的启示之一。”<sup>[7]</sup>作家们既富有艺术创造性而又不善于理性地概括和表达的特点,呈现在他们作品中,就是“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尤其因为违反常规和审美创造在他作品中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有时是无意识的……”<sup>[8]</sup>也就是用原有的概念

范畴以及已有理论无法表述的现象。比如,热奈特发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一些不合常规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对《追忆》‘加强’的扫描(光学含义),也许同样使我们有可能(希望如此)从新的角度显示常常被普鲁斯特本人和时至今日的普氏评论所低估的一些特点(如反复叙事或假故事的重要性),或者更准确地描绘已然发生的特点,如事件倒错或多重聚焦。”<sup>[9]</sup>

实际情况是,以往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对应叙事性文本的叙事学理论,都是理论家对于优秀文学作品中艺术规律和手法的发现和概括。如我们已经反复引述的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其中就总结了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间问题包括顺序、时距、频率等方面的创造性手法,热奈特把这些手法称之为“与时间的游戏”。热奈特总结说:“内插、扭曲、浓缩,普鲁斯特的小说想必正如他标榜的那样是部‘失去并找回时间’的小说,但也是(或许更加隐蔽)一部‘驾驭、征服、控制、暗中破坏,或确切地说曲解时间’的小说……”,他进而评价说:“大艺术家对此从不吝啬,而这与他们的天才,即他们对一切理论,包括自己的理论的超前实践成正比。分析家的职责不是对此感到满足,也不是视而不见,手法一经‘揭露’后,他应当研究援引的动机在作品中如何作为美学中项发挥作用。”<sup>[10]</sup>在中国这样的情形也很多。比如,今天看来,“背面敷粉法”已经是一个命题了。这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对《水浒传》中人物进行分析时的发现和概括: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如果要施耐庵来谈人物创造,他依然不会用“背面敷粉法”这个命题。再比如“草蛇灰线法”,是金圣叹对叙述技法的概括。这种叙述技巧就是,有意地反复使用同一个词,使大段文章中贯穿着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索,就像蛇行草上所留下的痕迹,又仿佛是以筐盛灰漏泄于地,时断时续。这样一些例证表明,文本中的艺术手法和创新的因素,需要理论家的总结,只有将其用术语、范畴和概念等表述出来,即给予一个名字之后,才能进入理论。理论表述是发现的过程,只有对于文本的艺术手法和创新有了新的发现,概括和命名才成为可能。作家无法给自己作品的艺术特性命名,这个任务当由理论家来承担。如果说,以上所说是从理论上运用方法分析文本,那么,具体到本书中,则是产生了一些心得。表述如下:

首先,理论和方法作为作品分析的基础,帮助我们发现更具个性的艺术特征。比如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克劳德·布雷蒙(C. Bremond)的思想。克劳德·布雷蒙曾经提出过一种小说“三合一体”的假设,即任何小说都可以被概括描述成一种原子系列三阶段纵横交错的“三合一体”模式:

敞开一个可能性的情景
 

{	可能性的实现	成功
		失败
	可能性的非实现	

这是个最一般的叙述结构模式,但是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于,让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文本的时候,能以此为基础发现个性化的特征。我在分析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催粮差》时发现,这个模式非常适合。

其次,运用方法进入文本分析,由于分析者面对生动具体而且多变的文本,所以势必使方法细化了,从而有了更多的发现,相应地产生出若干个更加贴近该文本特性的命名。比如,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提出了互文性概念:“An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quotations; any text is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other. The notion intertextuality replaces that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poetic language is read as at least double.”(“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11〕互文性概念提出后,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地被批评家所用。但事实是,优秀文学作品总是创造性地使用互文。我在分析沈从文《菜园》的时候发现,这个作品淡远宁静、充满书香气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互文手法的运用。

### 三 本书的特点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已经初步形成了文本分析的一些特点,诸如分析性、学理性、各种方法的相通与转换,以及注重探寻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等。经过本书的写作,我共计已经分析了40篇作品。现在看来,40篇文本分析就是做了40道练习题。做得越多,发现越多,自然也就会不断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书的特点在于:

第一,对艺术效果的描述和对效果的追根探源性分析紧密结合。这个特点,与我为了圆满回答如前所述的那位行家所提的问题,深化了对文本分析的认识密不可分。首先,英美新批评理论家威廉·燕卜逊在他的《朦胧的七种类型》〔12〕中论述过文学批评家的职能。他认为,“ambiguity”作为一种艺术效果,首先是可以作为审美对象的,用来衡量“ambiguity”的审美尺度是简洁、含蓄、自然、合理。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这些要求的“ambiguity”,在审美过程中都是可以读懂的,是有价值的。如果是读者读不懂的“ambiguity”,就不是真正的“ambiguity”。由此燕卜逊认为,真正的“ambiguity”都是可以分

析的。他进而认为,表面上看,文学批评家似乎分为鉴赏性的和分析性的两种,但是从“ambiguity”既具有审美性又具有分析性来看<sup>[13]</sup>,文学批评家必须身兼二职。燕卜逊说:“批评家们更是一向过分强调诗的作用的神秘性,并认为只有他们的魔法才能用于理解它。在他们看来,诗像鲜花,不能用连根拔起或榨出花汁的方法来着手分析,因为这样便毁掉了它。据此观点,对此狂吠不已的批评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仅仅竭力突出花之美;第二类由于自制力较弱,在突出花之美之后还要刨根问底。至于我,必须承认,我有志成为第二类批评家。神秘的美使我感到不安的激动,使我意识到这儿便是进行挖掘的极好地方。我相信如果一行诗能给人愉快,那其中的原因就跟其他事物的原因一样是可以找出来的。”<sup>[14]</sup>诗歌如此,小说也同理,既可以被欣赏,也可以被分析。欣赏所获得的是审美价值,分析所获得的是艺术价值。既然这样,文本分析当然是以可以被欣赏为基础,对艺术效果的描述和对效果的追根探源性分析紧密结合就在情理之中。

对艺术效果的描述和对效果的追根探源性分析紧密结合这个特点,还来自我另一维度的思考:审美价值的延伸与艺术价值的重新发现密不可分。因为文本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所以,可能被理论家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不断地发现。因为文本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所以,在当代阅读中,审美价值才能获得延伸。而审美价值的延伸,是可以得到描述的。描述审美价值,意味对于艺术价值的研究有待深入。我在本书若干篇的文本分析中,时有“选择的理由”的小标题,即选择这个文本进行分析的理由。由此可见本书强化和体现从效果出发的思路。比如对老舍的《断魂枪》的分析《“不传!不传!”的魅力与“最后一个”的阐释空间》,比较充分地描述了苍凉的叙述情调、沙子龙的形象、沙子龙由“不传!不传!”而成为断魂枪的“最后一个”等方面的效果。然后分析这些效果。最后,分析了沙子龙为什么执意成为“最后一个”的原因。“最后一个”是历代作家都非常青睐的一个故事原型。在这个文本中,原因是一个空白点,即未定点,以往的读者,甚至老舍研究专家都对这个原因作过各种填补。我的文本分析则指出,这个空白点是这个文本艺术魅力形成的重要机制。

第二,更多地将艺术效果置放在文学史、文学思潮等文本之外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是与前一本书不同的。这个特点形成的原因在于,《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分析的对象毕竟不是母语文本,在思潮、文学史等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分析的难度比较大。而这次转向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的文本分析,则自由和自如得多。事实是,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考量和分析,并没

有束缚思维,反而产生了参照点。比如在对于茅盾的《石碣》等三篇历史小说的分析中发现,《石碣》等历史小说是他有意识地回到中国文化典籍中汲取资源、另走他路的艺术创造。这显示出左翼文学可以有当代读法。再比如我分析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回到了京派文人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中,以李健吾为什么评价《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问题为切入口,分析其特殊的情节结构及叙述方式,获得了对这个短篇小说艺术价值构成原因更恰当的看法。

第三,注重中国文化典籍为小说艺术提供的丰厚互文性基础,将之既作为关注的重点又作为分析的主要路径。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以前,文史哲不分家,历史著作诸如《史记》、《左传》等同时也是很优秀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互相借用。比如,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是即景抒情,因赤壁而想到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并进而产生联想:如果周瑜不是借助东风发动火攻而打败了曹操,东吴很有可能战败,那样的话,江东二乔也可能被掳到铜雀台充当曹操的玩偶了。可见历史上的三国史实已经成为典故被组合到诗人诗句中。何止是诗,小说中借用历史、诗歌、戏剧的互文现象也很多,比如《红楼梦》第23回题名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阅读《西厢记》,这是借先于此文本的文学文本组织情节的互文……《红楼梦》中这类现象非常丰富,无法一一列举。在本书中,文本中的互文现象,既是我审美阅读的注意点,也是我的文本分析用力点与路径。我认为,在互文性思路中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第四,本书的编排体例,依然遵循《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按照作品发表先后顺序的原则编排,意在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就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还在于这样的编排,作品仿佛一颗颗珍珠,被穿在一根时间的金线上,经受时光的考验,历久而弥新。本书以文本分析为主,在每一篇文本分析后面都附有作品……”<sup>[15]</sup>此外,特别要交待的是,题为《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按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是指1919—1949年,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考虑白先勇是海外汉语写作的优秀小说家,他的小说早已得到了文学经典的认定,而白先勇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写作,所以,为了他的优秀,我突破了现代的概念,选取了《游园惊梦》,特此说明。

## 注 释

- [1]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 [2] 同上。
- [3] [德]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孙周兴、李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 [4] [美]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 [5] [法]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蒋瑞华校,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 [6]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版,第64—65页。
- [7]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第188页。
- [8] 同上。
- [9] 同上书,第189页。
- [10] 同上书,第105页。
- [11]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37.
- [12] [英]威廉·燕卜逊:《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second edition, 1947)周邦宪、王作虹、邓鹏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 [13] 文中之所以以“ambiguity”标示,是因为燕卜逊的“ambiguity”理论在我国先后被翻译为“复义”、“含混”、“朦胧”、“歧义”等,为了避免理解的失误,而径直用英文原文。
- [14] [英]威廉·燕卜逊:《朦胧的七种类型》,第11页。
- [15] 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

导读 文学经典: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1

永远的故乡与鲁迅的返乡之路

——鲁迅《故乡》的文本分析/1

附:故乡(1921年)/8

目击沉沦者沉沦的小说艺术

——郁达夫《沉沦》的文本分析/15

附:沉沦(1921年)/23

我们今天如何读许地山的《缀网劳蛛》

——许地山《缀网劳蛛》的文本分析/48

附:缀网劳蛛(1922年)/56

废名的《桃园》是怎样写成的

——废名《桃园》的文本分析/69

附:桃园(1927年)/77

《一个危险的人物》的文学意义是如何诞生的

——王鲁彦《一个危险的人物》的文本分析/83

附:一个危险的人物(1927年)/91

聚焦于自我情感轨迹的叙述模式

——施蛰存《上元灯》的文本分析/103

附:上元灯(1929年)/111

童话文体魅力的当代体验

——叶圣陶《古代英雄的石像》的文本分析/116

附:古代英雄的石像(1929年)/123

“同故事人物”的限知视角叙述及其艺术魅力

——蹇先艾《在贵州道上》的文本分析/127



# 目 录

附：在贵州道上(1929年)/135

借用历史材料以构筑别样世界的小说艺术

——茅盾《石碣》等三篇历史小说的文本分析/147

附：石碣(1930年)/156

豹子头林冲(1930年)/160

大泽乡(1930年)/165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

——巴金《复仇》的文本分析/171

附：复仇(1930年)/178

女人成为流通物与文学意味的产生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文本分析/185

附：为奴隶的母亲(1930年)/194

意境和格调：艺术价值的主要来源

——沈从文《菜园》的文本分析/211

附：菜园(1930年)/218

由特殊的人生感觉而成就特殊的小说艺术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的文本分析/225

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1932年)/233

在无限虚拟中品味人生的艺术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的文本分析/250

附：九十九度中(1934年)/258

“不传！不传！”的魅力与“最后一个”的阐释空间

——老舍《断魂枪》的文本分析/272

附：断魂枪(1935年)/279